

學人往事

永不熄滅的火焰： 紀念韋政通先生

● 金觀濤、劉青峰

8月5日凌晨韋政通先生在台北家中嗚呼長逝。消息傳來，我們不敢相信。因為一個多月前，韋先生在給青峰電話中，還表達了對近年來思想大倒退的憤怒。他大聲質問：為甚麼中國一百年來僅有的一點點進步，就一風吹了？他認為知識份子還是應該做點兒事情，與我們相約明年一起參加台北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會議。我們絕對沒有想到，這是最後一次聽到韋先生那宏亮的聲音。

韋先生以他的《中國思想史》(1979-1980)著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國學大師。其實，韋先生是用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來回應一個巨大的挑戰：在全盤反傳統主義的當代如何繼承傳統？1902年梁啟超的《新民說》曾提出一個二元論的中國現代轉型方案：儒家倫理文化退到私領域，作為中國人的認同；在公共領域全面學習和引進現代普世價值。然而，隨着民初學習西方憲政失敗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一代的青年人很快拋棄了梁啟超的方案，加入列寧式的國共兩黨，投入反帝反封建革命；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主旋律。韋先生出生時，國民黨用新傳統主義對三民主義再解釋，與共產黨劃清界線，以反傳統為罪名去箝制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韋先生去世之時，正逢新文化運動百年，傳統文化第一次被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可以說，韋先生一生都在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思考五四遺產中度過。

上世紀60年代初，徐復觀、胡秋原等撰文大罵胡適是中國人的恥辱，李敖以《文星》雜誌為陣地連續發文，猛烈反擊。當時，韋先生很年輕，長期追隨牟宗三先生學習儒學，徐復觀先生曾為他謀職出提攜之力，於理於情，他都應該如徐復觀所期望的那樣站出來與李敖論戰。正是在這場中西文化論戰中，韋先生不懼怕背叛師門的指責，站到反思傳統立場，成為《文星》作者，和新儒家分道揚鑣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儒家強調忠君愛國的倫理等級秩序，早已被三民主義演化為忠於領袖、維護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工具，台灣知識份子在爭取自由民主時，必然會與這種新傳統主義發生巨大衝突。韋先生在〈理想的火焰〉中曾回顧這一事件，把這場論戰視為兩代人對時代提交的

答卷，他認為「從老一輩在論戰中所表現的思想內容，以及對待後輩的氣度，充分暴露了他們學問的空洞和為人的乖謬。……老一輩給我們留下的，仍是我們需要費力搬開的絆腳石」（韋政通：〈理想的火焰〉，載《知識人生三大調》〔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7）。自那時起，韋先生的著述及社會活動便與推動台灣現代轉型息息相關。韋先生曾出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也是澄社發起人和核心成員。這兩個社團聚集了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為台灣政治體制的和平轉型，在思想輿論界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90年10月《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在香港中文大學創刊，韋先生作為第一批編委和熱情參與者，時常與青峰通信、通電話。2008年觀濤退休到台灣政治大學任教後，我們對韋先生有了更多接觸和了解。每次造訪韋先生，他總是在電話中再三叮囑沿途細節，計程車一到小區門口，就能看到他在階梯下等候；一起到他家客廳聊天兩小時左右，韋先生就會拿上一瓶金門高粱帶我們到附近飯館吃飯，飯後他照例用自備牙刷刷牙漱口。接觸多了，也便會問韋先生一些私人問題。此時，韋太太慧傑女士已過世七年；他與兒子一家及孫女感情很好，我們問他：為甚麼八十多歲仍堅持獨居？他說，是我不同意他們搬來同住。他認為一個不能再為社會出力的老年人，其生存只是個人私事，自己照顧好身體，避免給他人帶來負擔，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他說自己是生前就做好身後事，把大量圖書，特別是與許多學者名流的私人通信，贈送給檔案館和中國大陸的幾所大學，供更多人參閱。韋先生自編了一套養生操，還拉着青峰跟着他示範動作學做。他說：要把身體當作朋友那樣愛護；我時常與身體對話，懇求他原諒我年輕時不知節制地使用他，現在要好好照顧這個朋友了。觀濤七十歲時，韋先生打電話說，「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變老的經驗」。在與韋先生私人接觸的點滴言行中，我們才能感受到他除了知識份子公共層面之外的個人道德追求。他追求儒家道德是如此具體和執著，但與那些以革命名義、改造他人的反傳統者不同，只將其嚴格限制在修身自律層面，從不以此要求、強加於親友和他人。

其實，早在1986年我們在費城賓夕凡尼亞大學訪學期間，好友傅偉勳先生就向我們推薦了韋先生的《倫理思想的突破》（1982），開始與韋先生書信往還。第一次見面是在1988年5月，那是韋先生闊別故土四十年後第一次返鄉。20日晚飯後，我倆騎自行車到北京大學勺園5號樓去看望韋先生，門衛甚嚴，扣工作證才准入。我們帶了十本收在第五批「走向未來」叢書中的《倫理思想的突破》，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第二次見面是1989年5月，韋先生和我們都出席了在北京香山臥佛寺舉辦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湯一介、樂黛雲先生設家宴招待周策縱、林毓生、韋政通、陳方正、孫長江等人和我們。樂先生下廚做出一桌好菜，孫長江帶來一瓶五糧液，在座各位聽周先生講自己在5月4日的經歷。當學生得知《五四運動史》作者來到天安門廣場時，立即熱情地包圍他，把他舉高抬起來。他激動地說，想不到自己有生之年能親歷五四場面。各位也都沒有想到，不久即發生了為1980年代思想運動畫上句號



圖左起：傅偉勳、金觀濤、劉青峰、韋政通於夏威夷恐龍灣（陳方正攝，1991年2月20日）。

的事件。1991年2月夏威夷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召開的中國文化研討會，使兩岸三地學界朋友得以在六四後相聚一堂。會上，已有學者質疑80年代思想解放、批判傳統太激進。韋先生的講題是台灣知識份子如何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一天下午，方正兄陪韋、傅二先生和我倆遊夏威夷恐龍灣、大風口。再看當年照片，不禁淚眼模糊。以心靈開放著稱的偉勳兄1996年病逝於加州聖地亞哥醫院，二十二年後，韋先生也永遠離開了我們。

我們曾經問韋先生，他如何看待死亡？他的回答非常明確：死亡是一種自然過程。他在晚年過着學者式獨居生活，寫作提綱尚攤在書桌，便毫無牽掛地離開世界，實現了他對死亡的詮釋。韋先生的逝世在台灣似乎沒有引起更多關注。追求個人夢想從來比理想更為實在，很少有年輕人再去讀他的〈理想的火焰〉。但是對我們這樣在情感上屬於二十世紀、又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思想者來說，韋先生的去世似乎割斷了我們對二十世紀的最後牽掛。

在心靈空曠的寂寞中，有時我們想去非洲看看，因為偉勳兄生前曾對我們講，他來世是個非洲人。韋先生沒有講過類似的話，我們又到哪裏去尋找像他這樣的朋友——一個思想開明、慎獨的現代儒者呢？我們想：只要儒學仍有意義，後繼者在做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時，在生活體驗中都可能看到韋先生的身影，甚至會在大街小巷中和他相遇。

金觀濤 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高級名譽研究員。

劉青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創刊編輯。